

“伟大的现实主义”: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进程中的吕荧文艺思想

韩清玉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吕荧热心参与革命运动和文艺建设活动,既创办杂志、发表文章,也进行大量文学评论和翻译工作,他的文艺思想与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艺活动一脉相承,形成了一套丰富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吕荧以“真”统领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坚持以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和根本原则,认为文学的本质即表现现实之真,现实主义文学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性和战斗性。吕荧的文艺与美学思想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也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发展。吕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研究路径对当下的文艺理论建构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新风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价值。

关键词:吕荧;现实主义;“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3-0045-10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3.005

在吕荧研究中,学界较多地关注由美学大讨论而声名大噪的主观派美学家吕荧,而对文艺理论家吕荧缺乏足够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吕荧先生短暂的学术生涯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者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吕荧更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在吕荧的文艺思想中,“现实主义”无疑是第一关键词。在文学基本主张、创作与评论实践方面,吕荧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创作原则与批评标准,在此以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口号渲染吕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活动与文艺思想,实不为过。^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吕荧的革命与文艺活动

吕荧,20世纪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其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与马克

收稿日期:2023-01-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互鉴视阈中的中国现代美学建构路径与理论形态研究”(22JJD750028);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西互鉴与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话语建构”(21RWZD03)

作者简介:韩清玉,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美学研究。

①当然这一借用并非完全是修辞意义上的。1944年,吕荧翻译了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并在“译者小引”中提出,卢卡契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是“真实地创作现实主义”,还是“打着现实主义的大旗”走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创作路线。他认为,真实的人民文学工作者应该“清算自然主义”。可见,吕荧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受到卢卡契很大的影响。

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密不可分。与当时大多数左翼文艺理论家一样,他一方面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这样一位在20世纪文学与美学版图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目前尚未有长篇传记和年谱记述其马克思主义文艺活动。鉴于此,有必要先从吕荧的革命活动和文艺建设实践两个视角加以论述。

学生时代的吕荧爱好文学,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苏联小说和一些革命文学理论书籍,并结合平日所见的农民困苦生活,逐渐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35年,吕荧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正是在此期间,吕荧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做一个革命文艺战线上的战士^[1]。他既写诗歌又写论文,参加了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与思想进步的朋友们合办文艺刊物《浪花》。1938年,吕荧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同年以“倪平”为笔名在《七月》《战地》等杂志上发表了《北中国的炬火》《退却》《北平之夜》《在“鬼不生蛋的地方”》等小说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以吕荧的切身经历为基础,深入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的生活,从中能感受到作者丰富敏感的内心、激昂的诗情与忧国忧民的文人风骨。据梅志^①回忆,胡风曾评价吕荧的诗歌有时情感过于火热,有时又太冷,吕荧也承认自己不能很好地控制情感的表达。尽管吕荧早期的文学创作略显青涩,但情感真挚、意蕴深刻,往往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

1939年,吕荧加入中共在西南联大的外围组织“群社”并投入革命文学活动中,在此期间,他参与创办报纸杂志,发表文章,进行文学评论和翻译工作。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吕荧自学掌握了俄、英两门外语,翻译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是其译介生涯之始。吕荧是国内首位译介、研究普希金及其作品的学者,1940—1944年,他翻译了普希金的代表作《欧根·奥涅金》,后更名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吕荧在《论〈奥涅金〉》一文中引述别林斯基的话,评论普希金这部诗体小说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2]308}。他认为这部作品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之路,在此之前,古典主义、消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神秘主义的作品充斥诗坛,文学不能以强大的光和热照耀俄罗斯原野并感动人民^{[2]307}。而普希金属于那种能在昏乱中洞见文学艺术的方向和使命、能从现实中发掘典型人物的“根”、能预示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的作家,他笔下的奥涅金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的主角,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典型。除了普希金,吕荧也曾多次翻译并评论列宁的作品,他先后编译或撰写了《列宁论作家》《列宁与文学问题》《列宁的文学思想》等文。吕荧认为,列宁的这些充满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打倒了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批评”^{[2]159},他的一系列朴素而深刻的见解都充满着至为宝贵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在长期的革命和文艺活动中,吕荧与不少左翼文艺理论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4年,吕荧在四川涪陵中学任教,经常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相关活动,经胡风介绍认识共产党人邵荃麟、冯雪峰等,并接触重庆文化界人士骆宾基等人。同年12月,革命作家骆宾基因向学生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吕荧闻讯立即奔赴重庆向党组织报告并设法营救。1945年2月,吕荧在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内容的了解与形式的了解》一文评论杨晦的《论曹禺》。在这篇论争文章中,吕荧以纯正的现实主义立场,较为准确地分析阐述了曹禺剧作的主题以及曹禺本人的思想观念问题。同年,吕荧与何其芳在《萌芽》上发表《关于“客观主义”的通讯》,二人就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倾向是旧现实主义还是客观主义进行讨论。同年,吕荧夫妇筹资以泥土社名义出版论文集《人的花朵》,对鲁迅、艾青、田间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这本书展现了吕荧极高的文学鉴赏力和敏锐的艺术眼光,使他融入了左翼批评阵营,也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发展。1946年,吕荧与进步教授方敬、潘家洵等共同创办综合性刊物《时代周报》以争民主和平、反内战独裁。此刊物先后共出版十余期,吕荧在此发表过文艺和史学方面的论文,在贵州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①梅志(1914—2004),本名屠纪华,又名屠琪(或屠棘),是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胡风的夫人。

1949年4月,吕荧应邀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加入全国文协;10月随罗烽去大连了解、辅导工人文艺创作。在大连期间,他“读过几百篇工人的文艺作品,看过工人演出的节目,组织了工人文艺创作小组”^{[3]4},实地考察工人文娱生活,开展创作活动。吕荧坚信工人是人类社会的建设者和文化的创造者,把工人们从充满剥削压迫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正是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让工人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主人,让他们在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中受到锻炼和养育,他们必然会创造出伟大的文化^{[3]4-6}。

20世纪50年代,“吕荧在文艺批评与文学理论步履艰难的情况下,投入了美学的怀抱”^[4],勤奋地开垦着当时贫瘠的美学园地。他以“美是观念”的鲜明观点参与到美学大讨论中,被认为是“美在主观”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了《美学问题》《美学论原》等文章,与当时的美学大家蔡仪、朱光潜等人展开激烈论战。虽然历史并没有给吕荧继续从事美学研究的机会,但他的美学思想拓宽了当时的美学视野,也丰富了对美的本体论的探讨。

1950年10月,吕荧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教授《文艺学》《苏联文学史》课程。他讲课条理井然、分析透彻、见解精辟,有扎实的文史哲功底,待人处事耿介不曲、爱憎分明,似乎内向深沉,实则热情诚恳、率真坦荡,十分受学生欢迎^[5]。吕荧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框架下教授《文艺学》课程。其学生李希凡回忆道:“他讲授的文艺学,在那时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贯串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能系统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教学,在当时的教师中还是很少见的。”^[6]吕家乡也曾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他讲授的文艺学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又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给予评点阐发,启人思考又引人入胜,系内外的听讲者越来越多。”^[7]足见吕荧的人格魅力及其课程的受欢迎程度。

由上可见,吕荧的革命与文艺活动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在青年时代即对无产阶级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接受,终生坚守革命真理。通过与左翼作家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工人文艺的自觉倡导,可以看出吕荧对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属性有深刻认识。第二,将革命实践与文艺实践有机结合,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文艺的组织、创作与评论实践中,与他的偶像鲁迅的革命方式有相似之处。

总之,无论是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还是在文艺建设活动中,吕荧始终保持着理性与热情,坚持真理,尽管历经劫波、命运多蹇,仍笔耕不辍,努力“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搬砖运瓦,铺平道路”^{[1]2}。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和美学研究的先驱和领军人物之一,吕荧的学术生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他的社会活动和文艺创作经历,鲜明地体现了其笔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寓意;他丰厚的著述、充满人文气息的研究路径、严谨务实的精神和至真至纯的人格魅力,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二、“真”与现实主义:吕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系统性

有学者指出,吕荧的文艺理论著作和评论“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上点画出了中国新文学前行的印记,也体现出了一个具有创作经验和深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的研究者对于艺术的真知卓见”^[8]。换言之,吕荧的文艺活动与理论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与方法的重要体现。

1943年2月在《人的花朵》一书中,吕荧从文学活动的整体过程阐述了诗人与世界、诗与现实的关系:

具现着现实的“真”与“纯”,获得了个性的风格与艺术的完成的诗人,他的诗篇将为人所传诵,他的诗中所抒写的个人的感情和事象,正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阶层的智者底情感与理知:这一切与他的诗篇一同,永生在诗的世界与人的世界里面^{[9]61}。

“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要旨,也是文学创作的普遍原则。吕荧一直强调这种以“真”为导向的创作态度,他的“真”既“包含着艺术精神上的现实主义属性,也包含着思想内容和艺术思维上的规定”^[8],在内体现为作家主观情感的真诚,在外则表现为体认客观现实、深入考察生活本质的真实。现实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和根本问题,只有深入现实才能使文学作品达到深广的境界,也只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才能走上脚踏实地的、实践的、战斗的道路,才能为表现新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斗争服务。无论是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对文学作品风格的推崇,还是对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的理论阐释和运用,都反映了吕荧“从现实出发、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都始终体现着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方面,吕荧认为文学要表现现实之真。“真”是吕荧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贯穿吕荧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吕荧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发表于1936年的《关于国防文学的几个问题》,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吕荧就表现出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推崇。在1938年发表的《向着伟大作品的进行》中,吕荧对现实主义文学做了进一步论述,强调“真”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性。在《人的花朵》中,他将“真”引入“诗”的概念,“以‘真实’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点,以‘诗’作为艺术创作的高度,吕荧建构了一个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法则”^[10],即只有深入现实才能达到深广的艺术境界,才能使文学作品发挥价值。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感受生活、扎根现实,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理解、思考和探索,因为“一个作家的思想、生活、创作,是一个整体”^{[11]223}。

吕荧认为文学永恒的主题就是现实,一些以抽象的爱、死或复仇为主题的作品,即使是含有更深的生命追求的意旨,也是从人的真实生活避开而遁入空中,这种主题无力深入也不会永恒。所以,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使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达到深广的境界,这种深广绝非现实的抽象化,而是现实的血肉化。有些作家认为深广是由回避现实、绕圈子和浪漫幻想达到的,这就完全看错了写作的目的,违背现实曲意逢迎难以达到深广,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是苍白无力的。在吕荧看来,这种不能深入现实、落后于现实、游离现实、逃避现实的倾向,即文学上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是文学的根本问题。由于一些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仅仅见风使舵、摸索前行,从未认真反思批评过这一根本问题,导致公式化、教条化、图式的形象化、客观现实的自然主义化等问题此起彼伏,各种新的反现实主义层出不穷,而只有对从生活实践到创作态度、创作方法等一系列方面作彻底的自我批评,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在对文学作品属性和功能的认识上,吕荧始终坚持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和战斗性,强调文学作品要从现实出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时代服务。吕荧曾在《坚持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现实主义的路,是一条战斗的路。”^[12]他继承了左翼文学思想,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和战斗属性,强调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必须与具体生活紧密结合,文学不能仅仅作为一种书斋活动纸上谈兵,而要走上真正实践的、战斗的路,它需要文学创作者们坚持“脚踏实地的战斗”。“现实主义的路,并不只是一条认识现实或者表现现实的路,它包含着变革现实的意旨。他要求为人民事业献身的意志,科学的辩证的思维,艺术的创造的力量,面临现实战斗。”^{[11]367}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时代开始便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后来的革命文学原则上以为人民战斗为意旨,但其实践也并未脱离知识分子的圈子。但随着旧势力的崩溃和革命的推进,人民逐渐有了畅言的自由和创作的权利,在这个从未有过的空前进步的时代,文学就更应该深入生活实践、扎根社会现实、提高革命思想和战斗精神的觉悟,这对清除旧思想和开辟新道路都有着重要意义。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这个‘人民性’话语孕育”^[13]。关于“创造新的人民的文学”的课题,吕荧在《新的课题》一文中具体阐述了他对于新现实主义的人民的文学的实践方法、创作道路、价值意义的看法,集中表达了他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期待,对文学为人民、为社会、为时代服务的要求。“新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表现现实,表现典型的现实。……表现现实表现人民,将要使现实主义艺术更进一步地提高和发展,使创

作内容更为深刻和广大,将要使中国文学空前地丰富起来。”^{[2]130-131}可以看出,吕荧的理论观点依然围绕人民、生活、现实这几个关键要素展开,人民群众是文艺的表现主体,是文艺作品的鉴赏者和评判者,文艺的生命力始终需要依托人民的价值判断。

在坚持文艺的人民性、战斗性等社会属性的基础上,吕荧又强调文艺必须包含主观情感性和艺术审美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是作家的理知和情感深深透入现实本质的一个运动的过程”^{[11]303}。“理知”和“情感”的统一可以避免艺术作品流于政治性的宣传或个人化情绪的宣泄。在《谈谈新写实主义文学》一文中,吕荧一方面用意识形态来定义艺术:“艺术是组织大众意识形态,变革大众生活观念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只有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才能够感动大众,才能够教化大众,才能够具有组织大众的意识形态和变革大众的生活观念的能力。”^[14]他对艺术作品中的艺术性和情感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艺术与政治》一文再次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作品里光有政治倾向,仅是口号、标语、公式的图画,没有真实的艺术表现,则这倾向不论是多么正确、明确,也是不能产生高度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艺术效果的。”^{[11]236}吕荧在这里实际上取消了艺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认为政治效果与艺术效果是一致的,即主张文学作品中社会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吕荧的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的倾向”^[15]的观点是一致的,从中可见吕荧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

最后,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上,吕荧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现实主义必须与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公式教条主义和其他旧现实主义划清界限。它要真实地体认现实、表现现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突出真实生活,把握现实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需要作家探讨成因、追寻结果、分析因素、考察矛盾、把握社会发展的力量和动向,而不能只限于收集事实、用旁观者的态度记录描写。如果抛弃科学思想、放弃深入现实,仅凭借着一些肤浅的概念、一套半唯物半唯心的逻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观念,用主观知识进行文学创作或理论批评,不仅会降低水准、混乱观点,也损伤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为了进一步阐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吕荧曾以左拉的《萌芽》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例,将其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作对比,具体分析阐述了现实主义与表象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区别:

弗罗贝尔和左拉的“现实主义”,虽然外表上是写实的,而且以科学的客观自命,可是它只是照相机似的写实,不能表现人和社会的本质,现实社会发展的道路和动向,只能描写一些现实表面的现象乃至于假象,铺张生活细节的枝叶,以现实的外形代替现实的本体。在实质上,这个“现实主义”反艺术的概括性,反人物的典型性,反诗的想象性,这是一种假“科学”的庸俗的现实主义^{[11]302}。

在吕荧看来,左拉的创作方法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照相机的方法,通常以表面的或现象的观察来代替内部的、本质的探索,以生活和人的枝叶来当作它们的本体,把现象当作真实。所以,尽管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也能将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丑陋黑暗的面貌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一幅幅现实的甚至血淋淋的生活图景,但他对造成这种生活图景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缺乏关注,仅仅把这种社会悲剧归因于人的生理欲望支配下的自然人性,一切归之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的社会属性没有关联,其结果自然就无法揭示社会的矛盾乃至为这种矛盾的解决提供合适的解答路径。吕荧反对自然主义创作对事物表象的罗列,反对以铺张表面枝叶来代替对本质的描写,反对“以现实的外形代替现实的本体”。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往往只带来没有结论的文学现实,人物形象也缺少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从而丢失了人的本真面目和终极意义,最终也就导致文学丧失了本源的社会教化功能、批判意义和战斗价值。

与左拉不同的是,巴尔扎克凭借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内部本质的深入挖掘,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力量和动向,真正表现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表现出

了社会的本体: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要求越过表象,认识事物的本体,把握本质,分析事物的因素,追求它的原因,再综合地具现出来;这样的创作过程,包含着客观的辩证的思维,包含着“有远见与有勇气去发见萌芽”的素质^{[11]302}。

在吕荧看来,以上三位作家的创作存在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自然主义“铺张生活细节的枝叶来代替社会现实的本质;表面上和现实主义很相似,实质上是很不同的一种创作”^{[11]318}。吕荧这样定义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阶级本质是小资产阶级,它的思想内容是观念论,它的生活态度是客观主义,它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11]320}自然主义创作以现实的外形代替现实的本体认识,以所谓“出神入化”的创作技巧粉饰表象、掩饰作品内容的苍白破碎,看似栩栩如生的形象都是无意义的辞藻堆砌,人物的情感和思想是空乏的,没有真实的本质,无法完成艺术的真实。吕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分析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真实观的差异性,在他看来,自然主义的真实观遵循的是机械唯物论,而现实主义真实观则秉承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因此,作为现实主义文艺观的践履者,必须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反对自然主义,反对机械的、表层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批判艺术作品中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书写样式。

吕荧曾援引恩格斯《给爱伦斯堡的信》一文论证,“如果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肯定而且反映历史现实底必然规律的时候,‘不把它当做研究历史(或现实)的线索,而把它当做现成的滥调,就这么勉强地去凑合历史(或现实)上的事实’,就要发生唯物论的思想内容‘变成了它的反面了’”^{[11]319}。所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创作是通向现实主义的前提,但不是现实主义的全部。“思想观点上的客观主义并不妨碍他做文学创作上的自然主义者”^{[11]319},而这种自然主义的创作只能反映出若干的真实,并不能表现出典型的现实,不能彻底地摧毁旧世界,完成革命文学的任务。

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并不简单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它“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真实,更是一种高于历史的真实”^[10]。作家要集中地、有意识地抓住真实的本质,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对细节进行有选择的区分和删削。吕荧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①为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他提到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斯对《伊利亚特》疑点的分析,希罗多德斯探讨了诗人写作的中心主题和选择标准问题,特洛伊战争的中心是为了争夺海伦,但为何荷马诗中较少谈及海伦和爱情,而更多叙述战争和英雄?这对史学家来说是关于事的真实的问题,而对于文学家来说则是关于诗的真实的问题^{[11]337}。在《伊利亚特》中,海伦私奔只是战争的导火索,但荷马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海伦与帕里斯的爱情故事,而是特洛伊战争的本质起因,是希腊英雄与神的颂歌,是“那个时代希腊人的生活思想情感最中心的、最深的境界”^{[11]337},这一宏大的史诗的主题也就决定了战争和英雄才是重点,海伦只是无关轻重的细节。诗人舍弃了对细节真相的追问,而是将重心放在现实的本质和创作主题上,“在吕荧看来,诗人如此的安排是他对于一种更高远的‘诗的真实’的求索”^[16]。吕荧关于“诗的真实”的重要观点,无疑是对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遥远呼应,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范式的重要体现。

三、吕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与实践

在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上,吕荧也始终如一地遵循、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且在文学评论的具体应用中进一步补充阐释他对于文学本质、文学属性、文学风格的理论探讨。吕荧通过探讨鲁迅、曹禺、艾青、田间等进步作家的艺术创作,结合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具体阐述了他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观点和见解。在吕荧看来,“任何一个作家,他的产生和成长,都不是偶然的,或是不可

^①吕荧将其译为“伊利亚德”。

理解的,他有他现实的根,他有他生命的路”^{[9]59}。而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作家更是如此,他们比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更强烈、更深沉,他们需要在烽火漫天、枪林弹雨中开辟新世界的道路。以鲁迅为例,他的创作发展进程就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对人民大众的爱与为人民大众而战斗”^{[9]103}这一观念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决定了其创作形式的嬗递、主题的范围和发展的方向,也使他成为第一个中国人民的作家。吕荧认为,鲁迅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在中外文学经典的滋养下独创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而曹禺的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除了运用欧美现代戏剧技术等卓越才思外,现实也是他重要的创作根源之一。如果以虚伪代替真实、脱离社会基础,剧作就无法焕发艺术生命力。正是因为真实生活中孕育,才能声色灿烂、深入人心。

伟大的诗人也是如此,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与诗结合,通过手法、格律和语言,抒写感情、理念和形象,其诗歌作品也各有现实契机、社会因素、传统教养和时代憧憬。如果诗人脱离现实,就只能走向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的道路,把玩弄文字技巧作为主题;如果诗人仅仅充满战斗热情,但语言粗糙、观念化并且缺乏锤炼,诗歌就只能变为理论宣讲与口号的集合,流为冗赘空泛的呼喊^{[9]61-63}。真正的诗人要抒写时代的真实,随着现实发展而成长,“尤其在今天,伟大的民族革命解放战争无疑地带给了中国的诗以新的生命,新的道路”^{[9]63}。吕荧以田间和艾青两位诗人不同的诗作风格发展为例,具体阐释论述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艾青的诗歌风格和创作手法是随着现实发展而逐步成熟的,他的诗体现着鲜明的农民意识和浑厚广阔的风貌。艾青早期抒写人民和战斗者形象的创作由于受限于生活体验,并不及他歌唱自己情感的作品生动真实,而随着他与人民交流的深入,随着他的诗的理念进一步完善,随着在创作过程中对现实契机的深度把握,随着他对艺术手法的纯熟运用,艾青逐渐清除了受象征派、意象派等创作方法影响的痕迹,更深广地展开了创作方法中的现实主义素质^{[9]71},最终将诗的风格融成完整的结晶。

对于田间的诗歌创作,吕荧认为他与艾青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和方向。无论是诗的形式、章法和格律,构成感情形象的意象与风格,还是体现感情形象的方法和道路,艾青是旧风格的综合,田间则是新风格的创始。艾青在凝练字句和章法结构方面更细腻精准,而田间则是在章法不甚谨严的诗句中起伏着战斗的脉搏和感情。田间的创作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这种新形式的表现方法“不仅超越了一般的表现方法的庸俗性、退守性,而且融合了未来派的健康、力动、战斗的气质”^{[9]80}。但是,因为有别于中国读者熟悉的诸如和谐的旋律、整齐的字句、柔和的色调等传统风格,田间诗歌的新形式也遭受了许多攻击和非难,吕荧主要针对列论最多的张振亚先生《评田间底近作》一文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辩驳。他认为张先生歪曲化、狭隘化、文字技术化了诗人的现实任务,模糊了“形式”与“创作方法”两种概念,对诗的理解流于庸俗与肤浅,既不了解田间诗的成长发展道路,又不了解战争的抒情诗的现实意义,导致其最终不能解明田间优缺点的根源,也不能解明其诗歌的发展方向。

在吕荧看来,田间的诗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创作内容从感情进入生活领域,但在创作方法上未能充分展开深度把握生活的能力,他感情的个人属性过于鲜明而缺乏生活的本质性和深刻性,有时也未能妥善处理章法结构与情感的平衡关系,所以“诗人田间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诗人,是一个在演化发展过程中的诗人”^{[9]91},不必讳言其弱点和失败,但也不可抹杀他的成功和发展。吕荧认为,田间发动参与“街头诗,传单诗”的运动,让他与战斗和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语言风格得到了澄清和洗练,也让他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了现实生活。在吕荧看来,田间逐渐抛弃了知识分子的灵魂,逐渐走向战争和民众,只有这样由苦难现实养育出的诗人,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接受和喜爱的作品。

可见,吕荧文学批评的总体方法是现实主义。与其文学本质观和创作论一致,考辨其批评对象的社会现实源泉,阐述艺术作品与社会革命、人民需要的深层关联,这是吕荧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呈现。虽然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但吕荧并没有停留在思想主题批评的层次,而是深入文学作品的风格与形式语言,即从文学自身的肌理把握与宏大历史现实对话的可能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吕荧对作家的批

评不是静止的,而是历史地看待作家的成长与其作品风格的变化,深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原则之精髓。

综上,吕荧以“真”统领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无论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属性、文学功用的认识,还是对文学创作风格、文学创作方法、文学批评实践的把握,吕荧都多次强调文学作品深入现实、表现现实、服务现实的现实属性,强调文学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时代服务的人民性、实践性和战斗性。只有将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贯穿始终,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达到艺术之“真”这一创作境界,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吕荧对艺术真实性问题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对现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8]。

四、最贴近文艺现实的美学与最贴近社会现实的批评:吕荧文艺思想的启示

与文艺思想一样,社会性与主体性同样是吕荧美学思想的两大鲜明特征。首先,吕荧将美的本质归为一种孕育并成熟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美的观念是主体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美的形态随社会现实的发展而变化,美的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以其独特的职能反作用于社会。其次,吕荧重视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他认为美归根结底是人的意识而非物的属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吕荧的美学研究视角全面,研究方法辩证灵活,治学思路清晰严谨,他兼顾了审美活动中的主客观因素,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重维度有明确考量。他对主体性的高扬,既切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路径,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也完成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加冕”^[17],又彰显了那个特定年代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而他对于美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强调了美本质的现实客观性,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吕荧看来,“明确美是社会意识之后,我们就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新美学的研究,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批判的接受过去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美的遗产,使美学积极参加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和美术”^[18]。

在此为什么要讨论吕荧美学的基本观念与特征呢?这是因为这些观点与视角对当下文艺批评理论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即寻求一种真切关心社会现实的理论话语,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最根本素质。吕荧对美的本质的认识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坚实地奠定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美作为人的一种观念,形成于广阔的社会之中,因而作为美的集中体现的文学艺术就必须反映深广的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吕荧为美的观念和美学这门学科赋予了指导价值,将美学的基本功用规定为参与艺术创造、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主义要求、满足人民需要的作品,美学社会功用的最高纲领,就是“积极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19]。文艺创作需要协调好真、善、美的平衡,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提升自身品格、积极向前迈进、深入现实生活,给人们积极健康的引导,从而更好地发挥文艺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滋养作用。

吕荧是现实主义文艺精神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他正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理论,逐步形成了自己以“真”和“诗”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论,他的理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文学研究应当高度关注社会成员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学主体意识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规律。”^[20]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不是孤立地、理想化地看待文艺现象和问题的,而是在宏阔的历史视野、现实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加以阐发说明,它要求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既要尊重艺术审美规律、彰显作品的美学价值,还要洞察对象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从唯物史观的视野来把握人物和事件,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其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根本价值归宿,就在于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它不仅包括人的社会解放,也包括人的审美解放和人性的丰富发展,而现实主义文学在促进人性解放和发展、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汲取现实主义理论精华、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一直是有良知、有责任的文学创作者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和承担的重要任务。

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学创作者一旦无力深入把握现实并体察本质,就只能向逃避和消解中寻求出路;一旦无法对社会历史发展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就只能言说个人话语,因之而造成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隔膜和撕裂,难免使文学作品失去反映社会现实的厚重、体察历史的深刻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样的文学最终只会走向沉寂。只有回归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只有直面社会现实并通过创作与其产生行之有效的对话,在现实的真实和历史的厚重中思考问题并挖掘意义,才能达成对社会存在本质的洞悉和对深层精神维度的探索与关怀,才能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精神与批判潜能,才能使文学重焕生机。

回溯文学史发展进程,现实主义是主流文学创作坚持的基本原则。要坚守住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必须把握好美学与历史二者关系的平衡。缺乏美学维度的历史评价会使作品流于政治宣讲工具,从而抹杀文学的审美属性;缺乏历史维度的美学评论会使文学作品沦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形而上的空泛,在雕琢形式中走向疲乏。“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21],只有深入现实社会生活并对社会现实认识清楚、思考透彻,才能使历史和美学观点达到和谐统一,才能更好地辨识现实主义文艺精神的内在生命力。

吕荧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艺活动一脉相承,形成了一套丰富完整的话语体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有着极强的洞察力,正是基于这种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与揭示,它具有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揭露现实的批判性等特点,其社会性和文化性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相关联,也表现了独树一帜的精神风貌。因此,如何在适应社会发展进程和时代特征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使其既坚守住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能充分凸显时代特色,并且积极汲取其它文学创作方法的养分,在螺旋上升发展中实现提升和深化,是当代文学艺术活动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近年来,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呈现繁盛之势,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勃发出强大的力量,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正在有力回归^[22]。这本身即构成了现实主义话题的当下性。而重温学习文学先辈对现实主义命题的经典探讨,则是此课题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吕荧的文学理论以“真”为核心并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体现着和谐辩证的哲学智慧,他在文学与现实、作家与时代、作家与作品以及艺术品自身的表现力等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和阐述。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刻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方向,其贴近文艺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文学与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也对我们推进当下的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路径指引作用和理论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吕荧. 我的小传[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上.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 [2]吕荧. 艺术的理解[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 [3]吕荧. 关于工人文艺[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 [4]萧白. 追忆吕荧[M]//萧白. 五色贝壳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90.
- [5]赵淮青. 铁骨金声 巍巍某人——吕荧先生逝世35周年祭[J]. 炎黄春秋,2004(6):65-69.
- [6]李希凡. 回忆与哀思——编后记[C]//李希凡. 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546-548.
- [7]吕家乡. 怀念吕荧先生(上)[N]. 齐鲁晚报,2014-04-09(B05).
- [8]谭好哲. 吕荧先生的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J]. 文史哲,2013(1):155-164.

- [9] 吕荧. 人的花朵[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上.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 [10] 张伟. “真实”与“诗”——吕荧现实主义文艺观管窥[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67-71.
- [11] 吕荧. 文学的倾向[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上.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 [12] 吕荧. 坚持现实主义的路[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197.
- [13] 段吉方,沈文秀.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1):15-23.
- [14] 吕荧. 谈谈新写实主义文学[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512-513.
- [15]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C]//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0.
- [16] 徐秋雅. 吕荧文艺思想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文学院,2011.
- [17] 姚勤华,陈兰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释义: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研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25-33.
- [18] 吕荧. 美是什么[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407.
- [19] 吕荧. 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M]//许振轩. 吕荧全集:著作卷·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293-294.
- [20] 高兴. “左联”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方法革新[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53-60.
- [21]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M]. 满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595.
- [22] 饶翔. 文学创作向现实主义有力回归[N]. 光明日报,2022-11-12(1).

“Great Realism”: On Lv Ying’s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Marxism

HAN Qingyu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Lv Ying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d literary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He not only founded magazines, published articles, but also carried out a lo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 Hi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s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ith his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i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Marxism, forming a rich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Lv Ying started his realistic literary thought with “truth” and insisted on realism as the basic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eation. He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was to express the truth of reality, and realistic literature should adhere to the sociality and militancy of serving the people. Lv Ying’s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 thoughts are based on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is realistic literary theory not only inherit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letarian new literature. The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and research path of Lv Ying are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shaping of a new trend of realistic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Lv Ying; realism; “truth”;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编辑 张伟 李裕政)